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400頁。

中村元哉^{*}

顧孟餘（兆熊，1889-1972），曾赴德國留學，回國後任職於北京大學培養人材，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後，歷任國民黨黨報武漢《中央日報》社長，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鐵道部長等職務。這位國民黨員在日本恐怕無人知曉，甚至如果遍詢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可能多半都不會對他有印象。不僅如此，對「兩岸三地」（中國、台灣、香港）的中國近代史學者來說，顧幾乎也已經是一個被遺忘的人物（本書頁1）。那麼，為何作為台灣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領軍人物的黃克武先生，偏偏選擇了顧孟餘作為研究對象呢？同時，以作為實證主義思想史研究者而享有聲譽的他，為何特意選擇在2020年這一年，在香港出版這本專著，這難道僅僅是偶然的重合嗎？對於顧孟餘的經歷和政治思想多少有所了解的我來說，不禁還是會感到好奇，顧孟餘是如何吸引黃先生的目光的？

顧孟餘活躍於中華民國大陸時代（1912-1949）的後半期，亦即國民政府時期（1927-1949），以及實施憲政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時期（1948- ）。他也是一位歷經無數次政治打壓後，在政界和輿論界仍然得以生存下來的國民黨員。國民黨黨內基本上分為蔣介石的「右派」和汪精衛的「左派」兩大勢力，中日戰爭爆發前，顧孟餘從屬於由反蔣親共轉為反蔣反共的汪精衛勢力。然

*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養學部准教授

而，近年獲得顯著發展的國民黨史研究已經證明，機械性地將國民黨內部劃分為「右派」或是「左派」並不妥當，而且明確劃分界線的同時，也會使得派系集團的形象固化，所以這一做法基本上已經被完全否定了。儘管如此，如果日本研究者還記得顧孟餘是以汪精衛為頭目的國民黨「左派」的兩大重鎮之一的話（另一重要人物為陳公博），那應該歸功於為本書撰寫序言的山田辰雄先生（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在研究上莫大的影響力。如果以今日的研究狀況來重新審視山田先生的貢獻，應該是從另一角度來觀察，那就是他很早就提出了顧孟餘等人在國民黨內一直重視自由、人權、民主政治等普遍價值。¹而本書則是精心探究顧氏這一不屈信念的一部大作。

本書最大的魅力和研究意義，在於從實證史學的角度對顧孟餘形象不遺餘力地進行刻劃。作者將有些病弱而低調的顧孟餘在經過多次政治上的歷練之後，仍堅持自己信念到底的形象展現給讀者。在汪精衛走上和日本合作的道路後，汪和被認為屬於他一派的人都被看成是背叛民族的「漢奸」，而重視普遍價值觀的顧孟餘則選擇到在重慶進行徹底抗戰的蔣介石旗下盡力，並得到蔣的重用，被提拔為中央大學的校長。但是，重視學術自由的方針卻導致他和蔣介石與黨內重要人物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他對蔣介石也漸感失望，最終在 1943 年選擇遠渡美國。當他再次回到二戰戰勝國的母國時，已經是 1948 年，同年，中華民國開始實施憲政，可以說是實現了他的政治信念。但是同時，他也認識到在蔣介石主導下進行的憲政過渡，無法讓作為一個共和國的中華民國獲得重生。於是，他斷然拒絕了行政院副院長的職位，放棄入閣，從此遠離權力中心。

顧孟餘原本應該可以運用自身豐富的從政經驗繼續活躍於言論界，但他卻逐漸失去自己的政治前途。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顧孟餘自身的足跡，尤其可顯示其坎坷的晚年生涯。顧孟餘在堅持舊汪精衛派「批蔣反共」的政治立場時（頁 2），對在台灣發動強權政治的蔣介石也越來越反感。因此，如果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那麼無論是留在中國大陸還是前往台灣，都無法成

¹ 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東京：慶應通信株式会社，1980）。

為他的選項。此時，他選擇了香港。雖然香港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卻可以在冷戰的背景下謳歌自由。於是他便以香港為根據地，聯合國民黨內的反蔣人士，包括過去和汪精衛身邊人士也深有交情的軍人張發奎，以及曾經致力於制定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勱等人；在反蔣的李宗仁（廣西派）和美國的援助下，積極集結國共兩黨黨外人士組成新的「第三勢力」，這既是「自由民主大同盟」，也是「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第六章）。

這些政治運動的理念被歸納為「國家獨立」、「政治民主」、「經濟平等」、「文化自由」等口號，在《大道》（1950年創刊，第四期後停刊）以及《中國之聲》（1951-1953）等刊物中得以具體呈現（頁239、250）。除此以外，更引人注目的是，該運動因為組織內部的分裂和來自蔣介石的壓力而無法在香港立足之後，顧孟餘又從香港轉移到日本（1952-1955），在冷戰背景下的日本也通過發行《民主勢力》（1951年創刊）進行政治活動實踐（第七章）。就這樣，他在對抗中台獨裁化的同時，在東亞冷戰背景下，致力結合香港和日本，擴大自由主義的政治勢力，意在「兩岸三地」實現自由、人權、民主政治這些普遍價值。

顧孟餘就是在這樣動盪的時代中，憑藉自己冷靜沉著的態度和理性的力量將自己的信念堅持到底，正如本書書名評價他為「清高」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書中也曾用「太陽神」來形容他的人格魅力（作者〈自序〉，頁xix）。此外，「清高」一詞，是圍繞1925年善後會議問題上與顧孟餘對立的胡適，對堅持不參加會議的顧的性格的評價。清高的顧孟餘確實不是具有「政治向心力」而能號召、動員眾人之人，1955年「第三勢力」運動失敗後，他也不時接受自己曾經批判過的蔣介石的經濟援助，在美國和台灣度過了餘生。

顧孟餘的一生，在本書中透過以下的章節得以呈現在讀者眼前。

山田辰雄序 / 自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早年生涯（1889-1924）

第三章 左黨要人（1924-1931）

第四章 汪蔣合作（1931-1938）

第五章 豔電之後（1938-1949）

第六章 第三勢力（1949-1952）

第七章 步入尾聲（1952-1972）

第八章 結論：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

附錄：顧孟餘著作分類目錄 / 參考書目 / 圖片出處 / 索引

作為一種人物傳記，本書內容如上所概括，以下不再對各章節逐一摘述。作者通過本書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做出何種貢獻，以及還遺留什麼課題值得繼續探究？在有限的篇幅內，對此多加思考和總結更為重要。

本書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貢獻，至少有以下兩項。

第一個貢獻和本書的結論息息相關。本書對一生「能仕能隱」的顧孟餘，做出他「和胡適、雷震的《自由中國》一樣，共同推動了思想動員，促進台灣的民主化」（頁 316）的評價；與此同時，也主張「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顧孟餘以及與他立場接近的汪派或改組派人士在反蔣、反共的努力之中，仍表達出他們對中國所面臨之重大課題的敏銳觀察。」（頁 317）這個結論意在重現那些被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史觀抹去的歷史，並為讀者具體呈現，戰後在「兩岸三地」，特別是香港和台灣，中華民國史是如何延展和擴大的；筆者也對這項課題的必要性和有用性做過論述，對此結論表示贊同。²

本書第二個貢獻，是向世人證明，儘管有關顧孟餘言行的一手史料極為有限，如果能將顧氏周邊人物所留下的二手史料和已刊的基礎史料進行總動員，仍然可以有效確保研究的實證性。顧孟餘在北京大學執教時的學生、在他鐵道部長時期擔任秘書的周德偉的《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1937-1938 年間作為汪精衛秘書活躍於政壇的陳克文

² 中村元哉，《中国、香港、台湾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の系譜》（東京：有志舎，2018）。

的《陳克文日記 1937-1952》（上、下冊，陳方正編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張發奎的口述紀錄《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鄭義譯注，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以及總共 82 冊的《蔣介石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3-2013）都在本書中得到有效的引用。這些史料在本書中逐一得到細心的考究，這對海外研究者來說實難以做到，但卻能夠經由閱讀本書而了解到不同史料的內容和特點。比如將回憶錄作為史料進行利用時，常容易出現差錯，但是，以《落筆驚風雨》為例，作者使用時也能加以嚴謹分析，辨別出史料的錯誤，此種研究姿態同樣值得高度評價。

儘管如此，我對本書中的分析也並非完全滿意。比如說，雖然顧孟餘的相關史料比較少，但是或許仍可更深層次地討論顧的政治思想，特別是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中期的分析，本書著墨較為平淡。支持汪精衛的陳公博創辦《革命評論》，顧孟餘則主宰《前進》雜誌，藉以展望中國的將來（頁 122）。那麼，顧為何著重發揚民主政治？（頁 125）通過他的《前進》，或許可以更進一步加以討論。在闡明顧氏信念的部分（頁 125-127、131、221 等），如果能加重筆力更深入地剖析，或許也可更鮮明地呈現出其思想的一貫性。

此外，書中談到顧孟餘與很多舊汪精衛派的人物，則他們在日本展開了什麼樣的活動？而這些活動又具有何種意義？這些問題或許也可以再做進一步的研究。面對「兩岸三地」呼籲建設「反獨裁反共產」的「民主國家」，在日本發行的《民主勢力》確實也呈現了顧氏信念的一貫性（頁 279）。其次，包括顧的人脈在內、欲求擴大的「第三勢力」的人際圈，和戰後在日本的「滿洲國」、以及與汪精衛政權關係緊密的日本人際圈，是怎樣重合的？近年來汪精衛研究已有所進展，汪精衛人脈在戰後的延續情況已趨向明朗。³關於「滿洲國」、汪精衛政權的人際圈，以及國民黨內反蔣勢力的人際網絡在戰後的香港和日本是如何擴大的，這些問題以往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台灣，都很難進行討

³ 相原佳之、尾形洋一、平野健一郎編，《東洋文庫藏汪精衛政權駐日大使館文書目錄》（東京：東洋文庫，2016）；閔智英，《對日協力者の政治構想——日中戦争とその前後》（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9）等著作。

論，如今都應在謹慎去除欠缺可信度的日方回憶錄和證言紀錄的基礎上，⁴進一步地探討。確實，闡明歷史中的這一頁並不能完全刷新目前對戰後中國、香港、台灣以及中日關係的核心認識，但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和有識之士為何對香港的自由主義政治運動不甚感興趣？⁵難道是因為即便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日本還是期待與蔣介石和毛澤東政權建立關係，故而極力抹去與那些「漢奸」的關係？又或者是因為在戰前支持國民黨內反蔣勢力的日本力量並沒能充分穩固，從而對戰後所展開的活動產生了消極的作用？而對《民主勢力》進行財政支援的佐藤信夫（舊滿鐵相關人物）等人在當時是如何構築人際網，又是以什麼樣的姿態面對「兩岸三地」？這些問題或許值得日本研究者加以關注。

總而言之，本書作為一本優秀的學術專著是毋庸置疑的。面向以 2020 年的香港為中心的「兩岸三地」讀者，這樣的好書必定能超越學術的格局，向讀者訴說用歷史的視角進行思考的重要性。正如本書封面上的副標題所示，「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不可能」的「不」字經故意刪除，正是高度評價顧孟餘一生對於普遍價值的執著、追求中國近代史發展的另一個可能性。也或許是作為評者的我的過度解讀，本書彷彿正是在訴說不論身在如何困難的境地，對普遍價值觀的追求都不是不可能的。

⁴ 因為版權問題，退伍軍人與相關親屬的證言無法正式出版。筆者手裡也有未刊登的相關人員的證言紀錄（例如：逃到香港的龍雲一族，不僅在東京有人際關係，與日本的政治家與退伍軍人也有聯繫），但是卻很難通過一手材料來證實。東洋文庫裡也有戰後《日本人中國旅行記》藏品，但閱讀時需要去除裡面國共兩黨的政治宣傳內容，可參考：https://toyo-bunko.repo.nii.ac.jp/?action=pages_view_main&active_action=repository_view_main_item_detail&item_id=7449&item_no=1&page_id=25&block_id=47。（2021 年 11 月 11 日檢索）

⁵ 1953 年 1 月 23 日，駐印度日本大使館向外務省匯報了顧孟餘等人在香港的活動。參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中国内政並びに国情関係雑件・第 1 巻》，檔號 B21010138200，「（1）一般政況 / 分割 3」。